

冷通：从辛亥革命军师长到中国共产党挚友

王荣 纪桂发

冷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和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创始人之一,“镇江三老”“职教社四老”之一。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亲历了辛亥革命、创建民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

从辛亥革命军师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商会主席到爱国民主人士,冷通经历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民主建国和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深信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信念坚定执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从“革命救国”到“实业救国”

1906年,冷通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同盟会广西支部代理支部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任广西省民军混成协帮统,出师北伐援鄂。

民国建立后,冷通随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爆发,冷通在徐州拥护和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兴师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冷通为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内政部次长、代理内政部长。

1921年,冷通忧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退出了波诡云谲的军政舞台,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事业,创办江北盐垦公司、永安蚕种场、均益蚕种场、黄墟农场、三益蚕种场;曾任镇江商会主席、镇江水电公司、镇江中国国货公司、四益农场、中建农场、镇江县银行董事长等职;他兴学助教,创办或接办了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京江中学、建东中学、镇江初级职业园艺科学校。

1929年,冷通代表地方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农矿厅合作,创办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在村政、农业、教育、水利建设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20世纪30年代,镇江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看到众多洋货充斥镇江市场,严重影响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为提倡国货,繁荣省会市面,发展国内生产,挽救民族工商业,冷通、严惠宇、杨公崖等联合上海国货产销合作社及各大国货工厂,于1934年筹创镇江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4月3日《申报》刊载:

镇江冷御秋等筹创国货公司——股额暂定三万元,每股二十元,以期一般热心爱国之志士踊跃参加,藉谋实际,推销国货,挽回漏卮。现股本业经营有相当成就。筹备处设于王家巷八十一号,并由镇江中国银行开始代收股款。闻该公司之货品,均由上海及各省之国货工厂供给,精选优良新穎之货品,更求取薄利主义,藉谋减少舶来品输入。闻各界人士多热烈赞助,为我苏省会生色也。

1937年12月,镇江沦陷,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停办,创办的学校被迫停课,蚕桑业遭到严重破坏。冷通闻悉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蚕丝业的情况时,愤慨地说:“国家社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坎坷艰辛地开创一点实业,虽然也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终究是徒劳的。”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图为民建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侯补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振、黄炎培、冷通、杨卫玉、胡厥文;中排左起:章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从“拥护抗战”到“延安五日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冷通任镇江民众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协调接待过境抗战部队,协助构筑防御工事,维持治安秩序,接送和慰问伤病兵员,动员工商界购买报国国债,运送难民,开展抗战宣传,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

镇江沦陷前,冷通主持物资沿江西迁,利用商会中的轮船公司,将蚕种近20万张、显微镜多架转运到重庆;协助镇江、高资、桥头等处蚕种场部分技术人员分批乘轮西撤。这批蚕桑技术人员及蚕种为发展四川蚕桑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通、黄炎培、江恒源等在武汉成立“江苏省失业青年救济委员会”,进行救济工作;在武汉成立了十余个难民收容所,解决难民的吃住和医疗问题,帮助寻找失散亲人,半年时间即救济难民十万人以上。冷通等人还设立了“江苏纺织工业委员会”,在湘南常德漆家河镇筹建了“难民纺织厂”,开展生产自救,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事业。

1938年,冷通、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发动民众的意见。此后,冷通、黄炎培、江恒源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署访问了李宗仁。时值台儿庄战役前夕,他们三人与李宗仁长谈,并提交了一份动员民众抗日的意见书。

1939年1月,冷通、张澜、黄炎培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声讨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其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常有往来,共商时局,由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他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呼吁团结抗日。

1945年7月1日,冷通与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

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褚辅成等六参政员抵延》一文,女作家陈学昭、丁玲,新四军军长陈毅先后看望冷通。下午,冷通一行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晚上,中共中央设宴招

待冷通一行。宴会后,冷通一行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延安人民教育会召开的欢迎会。

7月3日,冷通参观延安光华农场。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招待所回访冷通一行,并赠送延安毛毯一条。双方商定两点:“国民大会”停止召开;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7月4日,冷通访问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俘虏学校,与陈毅、吴玉章会面。午后,黄炎培、冷通再访毛泽东。晚间,八路军司令部设宴招待冷通一行,朱德、周恩来出席观看评剧《三打祝家庄》。

7月5日,冷通一行结束延安访问,飞返重庆。

7日,冷通等6人面见蒋介石,讲述去延安商谈结果。14日,当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时,冷通等3人发表《关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讨论的书面声明》,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冷通等人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与冷通握手时笑道:“我们又见面了,有人说我们不敢到重庆来,这不是来了吗!”8月30日,毛泽东借张治中家约谈,冷通应邀出席。9月2日晚,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冷通出席。

9月5日,冷通等赴延安的6人,借中央研究院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席间,毛泽东向冷通等6人敬酒道:“诸公团结为怀,甚为钦佩。我向大家敬酒一杯,表示谢意。”

从“民主建国”到“投身新中国建设”

抗战胜利后,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士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冷通当选五位常务监事之一。《民主建国会章程》和《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确立了民建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当时民族工商业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期望。

然而,国民党制造了“沧白堂事

件”“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进行了抓捕和杀害,冷通等民主人士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人民、反动独裁的真实面目,当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之路是不现实更是行不通的。冷通的挚友黄炎培在1947年感慨道:“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6年,冷通赴解放区高邮县访问,还利用江苏省临时参议会会议长的身份,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和掩护镇江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斗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主建国会于5月23日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这个决议标志着民建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了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1949年9月,冷通以民主建国会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冷通被安排在观礼台就座,临到大典即将开始,周恩来总理特派王良仲邀请冷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949年11月13日,冷通在镇江报告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盛况,勉励镇江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共同建设新中国”。

1956年5月,冷通抱病参加江苏省现代化流域性巨闸射阳闸竣工仪式。事后,他激动地说:“苏北导淮工地那个场面可伟大了,几万到几十万民工队伍,看着真叫人兴奋啦!苏北人民从此摆脱水患灾难了。上百年来多少有志于修治黄河和淮河水患灾害的,都没有彻底成功。从封建王朝到国民政府,不谈大修水利,连预防水患也办不好。但是他们年年都向人民摊捐派款,不少钱都被贪官饱了私囊。私人研究治理中国水患的也不乏其人,如南通的张謇和我们丹徒的刘贾,都曾有志于此,结果也是无成。共产党的领导好,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现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文作者:王荣,冷通纪念馆文史研究室主任、冷通研究会副秘书长;纪桂发,民建镇江市丹徒区基层委员会原主委。)

文人逸事

巴金的“仓库”

崔鹤同

1983年底,年届八旬的巴金生病住院。他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两点钟来量体温。他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他的脑子不肯休息,在回忆他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希望在他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片美好的东西。

那些天,他坐在小沙发上,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他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1927年2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直到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时,他还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他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献出生命、从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徘徊”。巴金忘不了他,就像忘了一位知己朋友。他是巴金许多老师中的一

位,教巴金懂得了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遭遇噩运的时候给了巴金支持下去的勇气。

巴金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好的作品把他的思想引到更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他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他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他的爱、他的同情。即使把他关在病房里,他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他也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他这有限余生的消耗。

巴金把在病中回忆以往阅读过的文学著作,以及从中汲取的勇气和信心,称为他的“仓库”。这个“仓库”,自然也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凭借这个“仓库”,巴金顽强地和病魔作殊死搏斗,鼓舞着他奋勇前行,让生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钱伟长痴迷棋道

周星

在钱伟长的记忆里,假期里家中最热闹、最令他着迷的活动,就是围棋。他的父亲和叔叔们皆是围棋高手,那一方棋盘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充满智慧较量的战场。

每到假期,家中的围棋擂台赛便拉开帷幕。钱伟长总是眼睛晶晶地守在一旁,他是最热忱的观战者,眼睛紧紧盯着棋盘上黑白棋子的你来我往,一颗心随着棋局的变化而起伏。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记录,把每一局的胜负情况认真地记录下来。除了擂台赛,家里那些棋谱,如《海昌二妙集》等,也是他的宝贝。父叔们摆谱研究时,他就凑过去,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开学后,父叔们返回学校,但钱伟长对围棋的热情没减。他常常自己坐在棋盘前摆弄棋子,让它们在棋盘上演绎出各种各样的变化。虽然此时的他还从未敢和父叔们对局,但对围棋的热爱却在这一次次“摆谱”中愈发浓烈。

这份热爱一直陪伴着他成长。在小学、中学、大学期间,校内的围棋比赛成了他大展身手的舞台。靠着假期里积累的底子,他在赛场上如鱼得水。他的每一步棋都沉稳而睿智,那是长期浸淫在围棋世界里培养出的气质。一次次的对弈,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多次登上冠军的宝座。

时光流转,钱伟长已至耄耋之年,但他对围棋的爱好依旧没变。哪怕是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还能自己跟自己杀上一盘,落子的速度非常快。2007年10月,在上海大学乐乎楼居室里,他依旧像多年前那样摆弄棋谱。自己跟自己下,右手执黑先下,左手执白跟上。还下得特别认真,那股认真劲儿,就跟小时候看父叔们下棋时一模一样。

在黑白棋子的世界里,钱伟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智慧。对他来说,围棋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爱好,更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伴他走过漫长岁月,见证他对棋道永恒的痴迷。

徐伯昕善“拉”广告

顾燕

1925年10月,徐伯昕开始负责《生活》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条件极端艰苦,邹韬奋任主编,徐伯昕总揽了除会计外刊物的经营管理包括推广、发行、广告总务等余下的全部工作。

为节省经费,徐伯昕自行创作插图、广告画。他设计的广告式样新颖多变,“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各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

邹韬奋对徐伯昕“拉”广告”的才能非常佩服。每当出特刊,增加容量需要多一些广告补偿支出时,只要徐伯昕打几个电话或到工商企业一转,必满载而归。徐伯昕凭着自己深厚的美术功底,能对各家厂商的广告文字和式样给予很好的建议或代为设计画样,使广告做得美观又经济。如果新记牙刷广告,他以“一毛不拔”的成语来形容它的质量优良,受到工商界赞誉。

徐伯昕做广告,有一套操作性、技巧性的“法则”可循。他会把大小不同的广告加以编排,紧凑、整齐、协调,使之不影响文章版面。有不少厂商把登在《生活》周刊上的广告式样送到别的报刊上刊出,省却一笔设计费。

邹韬奋后来回忆说,徐伯昕“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说些恣恣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

到1931年,《生活》周刊从最初八九月份的印数发展到超过15万份,创下民国时期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也创下直至被封停刊,8年从不脱期的出版史话。

贝聿铭力邀赵无极作壁画

周惠斌

1979年初,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接下了自己在中国的第一项工程——北京香山饭店的建筑设计。香山饭店融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古典风格为一体,外形采用中国江南民居风貌,辅以内敛的庭院式建筑。

香山饭店设计完成后,贝聿铭指出,饭店厅堂最好的装饰莫过于壁画,于是力邀挚友、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创作两幅大型壁画。两位好友一拍即合,期望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奉献给祖国。随后,赵无极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之中。

由于香山饭店以白色为设计基调,因此,赵无极舍弃了自己最喜爱和擅长的色彩组合,将西方现代绘画技巧同中国传统文人意蕴充分结合,采用山水画面式,精心创作了两幅黑白山水壁画,它们构图开放、笔触有力、富有韵律,如同两块纹理丰富的大理

石,与大堂灰白色调的窗棂、墙壁以及考究的内部装饰相得益彰。贝聿铭非常满意,称之为香山饭店的“点睛之笔”,是中国现代建筑与绘画的联璧绝唱。

那时,赵无极的作品在国际画坛享有崇高声誉和地位,价格昂贵。然而,国内一些人却无法读懂并欣赏他的作品,甚至因为难以理解和接受,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事情。赵无极的两幅水墨四条屏壁画送去装裱后,他前往察看,竟然发现画稿被随意丢在地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连铺垫的废纸都没有一张,心中不免感到不快。

贝聿铭知道后,深为自己力邀而来帮忙的好友遭到如此冷遇而感到过意不去。虽然赵无极一再表示不用介意,但贝聿铭还是找到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交涉。后来,文化部邀请赵无极在中国美术馆和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个人画展,通过长时间的艺术交流,人们才慢慢开始接纳他的创作理念。

丰子恺诗讽《中央日报》

钟桂松

抗战胜利前,丰子恺一家曾搬到重庆,住在沙坪坝。

有一天,丰子恺看到《中央日报》上一篇题为“丰子恺令媛获得国文冠军”的报道:“第三届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学业竞赛,最近经教育部评定公布,浙大学生获榜者二十四人(包括龙泉分校五名),在全国各校中占第一位。闻漫画家丰子恺氏之女公子丰华瞻得全国大学国文冠军,英文第一亦为浙大学生张文彦所得云。”长子丰华瞻怎么变成“令媛”?

丰子恺全家看到这条男女不分的报道,都笑翻了天,被称为“令媛”“女公子”的长子丰华瞻更是哭笑不得。第二天,丰华瞻给《中央日报》负责这个版面的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要

求更正,信中说:

我非巾帼

敬启者:

第三届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学业竞赛,鄙人侥幸获得国文冠军。贵报刊登消息,昨已拜读,惟鄙人系丰子恺先生之子,并非“令媛”。贵报所载,想系误传,特请更正。此事本无必要,惟恐速离扑朔,引人误会,或将使男同学投情书于我,而女同学对我绝交,故奉渎耳。即请

中央日报集纳版编辑部大鉴
丰华瞻 敬启 六月九日

看到儿子丰华瞻给《中央日报》

写信,丰子恺忍住笑,在6月11日下午给夏宗禹写信说:

我也告诉你一件笑话:前日(六月九号?)《中央日报》集纳版载:“全国大学国文考试丰子恺令媛得冠军”,题下又云:“名画家丰子恺之令媛丰华瞻得冠军奖……”他们认为华瞻是女。报纸到时,大家哗笑。次日华瞻去信《中央日报》更正。其信中有云:“鄙人乃丰子恺先生之子,并非‘令媛’。贵报所载,想系误传。特请更正。此事本无必要,惟恐速离扑朔,引人误会,或将使男同学投情书于我,而女同学与我绝交,故奉渎耳……”

倘此信登出来,又要引人发笑。此考试乃三年前事,我家只华瞻一人参加。侥幸获得冠军,得教育部奖状一纸,及奖金六百元(三年前有用,今日已只能买糖果半

斤)。考的文题,听说是关于青年十二守则的。此题我想做不出好文章来。华瞻的冠军,完全是偶尔侥幸而已。姐弟们要他请客,他把这六百元去买了十个烧鸭,一大碗酒酿(土名醪糟),一下子吃完了。

丰华瞻6月9日的这封信,全文刊登在1945年6月12日《中央日报》的“读者与编者”栏目。《中央日报》的态度很好,也算是纠错即改。

1945年7月丰子恺去内江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提及这件事:

斯文日下逐江湖, 拈芥原同夺锦标。
万木凋时新竹秀, 群山低处小丘高。
鸳鸯扑朔随春水, 翡翠迷离傍紫巢。
宋玉容颜多艳丽, 教人错认作班昭。

一九四五年七月于内江

在诗中,丰子恺谦虚地认为自己儿子丰华瞻得冠军是“万木凋时新竹秀,群山低处小丘高”。但《中央日报》却“错把宋玉当班昭”,充满喜感,丰子恺不得不记录一下。